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研究



李栗燕◎著



NLIC2970821492



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进程中的对话平台研究

李粟燕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类课题（09JD71000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重点项目（NR2010013）



NLIC2970821492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从基本要素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解读出发,分析了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属性、对话平台建构的历史积淀、当代的理性思考和现实呼唤探讨了当代建立、发展对话平台的可能性、必要性,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角度,分别探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话中的推进创新和实践对话平台的现实举措,完成了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为旨归的对话平台解析。

本书不仅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的广大高校师生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阅读,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可供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社会思潮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研究/李栗燕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5028-2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5287 号

责任编辑:徐蕊 籍达心/责任校对:李影

责任印制:阎磊/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字数:203 000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理论的研究源于对问题的关注。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社会转型的深化,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动摇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甚至出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理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了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整合各种社会意识的价值取向,笔者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时代背景,来重新构建、塑造对话平台,并以构建对话平台为契机、为推手,通过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多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引领中实现兼容,在兼容中实现传播,在传播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书研究的思想和实践的逻辑起点便源于此。

无论是国外学者从结构角度进行的话语、话语权等与对话相关的因素的深入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无论是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的关系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环节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能研究,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等研究,都无不说明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重要地位。本书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论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则是对话平台的生成提供了制度文化基础和相关经验,现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无不孕育着建立对话平台的极大机遇。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不仅认识到建立“对话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建立“对话平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1. 理论意义

(1) 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是实践的产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与实践结合,才能发挥理论的真正威力,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如何回到实践、为实践服务?显然,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对话平台的建立这一环节。否则,科学的理论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理论的此岸,到不了实践的彼岸。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对话平台的建立,亦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列宁也曾经指出:“最

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对话平台研究，可以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视角，进一步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内容。

(2) 使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对话平台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理论上来看，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以外，它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舆论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开展本项研究，需要对这些相关学科进行有益的借鉴；同时，本研究也能够使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2. 实践意义

(1) 为当前和今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对话平台建立已有的理论与实践过程，据此总结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已有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对话平台建立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提出当前和今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新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对大众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书研究也致力于使大众了解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使他们更加自觉、主动和有效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活动中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对话平台构建的研究成果，对党和政府，尤其是对宣传部门、新闻出版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适应时代和实际的需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态势使社会主流形态受到极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样化的思潮涌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通过建立对话平台，用正确的理论加以引导，实现多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要阵地，引领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在国内外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今天，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及其创新研究作为核心，以对话平台的构建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是适应时代和潮流的需要，是为治国治党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的需要。

本书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结合调查研究、理论研究联系实践研究、历史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对比研究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展开了如下研究：大众、大众化、对话、对话平台等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其相互关系，对话平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推导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对话的产物→结合全球化时代背景、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领域以及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分析构建对话平台面临的时代挑战→从理论

和实践层面探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构建对话平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探析对话平台建立的具体举措。

第1章剖析了基本概念和基本要素。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由单一变为多元。当代中国日趋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及日趋多质的大众,必然要求我们对“大众”、“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概念的特定内涵、发展历程及时代特点进行新的定位和解读。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意识形态和文明话语间的对话重新成为全球交往关系的焦点。在当前价值观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借鉴多种文明间的对话,在当代中国构建一个主流价值观与多种社会思潮平等交流的平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第2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对话平台及其对现代的启示。第一,对话平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19世纪初期先进思潮中的合理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前期,对话、对话平台就已在各种流派思想之间发挥作用。第二,对话平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世纪、20世纪之交,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与时代变化相结合,引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五大洲的广泛传播。尽管世界社会主义曾遭遇巨大挫折,但是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第三,“对话”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的启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使其理论内部圆融自洽,同时还要面对不同的理论挑战,唯有“克己”、“服人”才能使自己永远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第3章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第一,全球化进程冲击了传统对话平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时,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二,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观丰富了传统对话平台的价值取向。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和挑战。第三,当代社会阶层的变迁改变了传统对话平台的主体构成。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以及利益冲突加剧的现状,尝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新探索。

第4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思考构建对话平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要想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必须转化为“大众话语”。因此,构建对话平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平等交流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属性的诉求。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在于用

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的利益,统一人们在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念要求构建对话平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多种社会思潮充分的对话和交流。第三,虽然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临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威胁,但是意识形态国际博弈新态势拓展了文化对话的广度、强度与速度,为对话平台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5章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构建。从经济层面来说,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的长期并存,导致了多种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产生和存在,混合所有制应运而生。从政治层面来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政治代表性功能,提高政治整合能力。从社会层面来说,社会多元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核心价值认同危机。从文化层面来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充分研究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增强党的文化整合功能。

第6章从实践层面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构建。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巩固对话平台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在当今中国社会建立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话平台,与稳固的物质基础,与党能否促进中国发展、能否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第二,增强执政党的先进性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以营造对话平台的民主政治环境。稳定的民主政治环境能够为促进对话平台的完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政治保障作用。第三,加大社会各阶层、组织等参与对话平台的力度。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组织之间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应当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增强社会各阶层、各组织的价值归属感,加快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第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提供对话平台的智力支持。在全球化大潮中,文化“软实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为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安全,建立对话机制,亟须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尝试了以下创新的探索: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中,以对话平台作为研究视角是一项创新。本书对对话平台的主体、客体、主旨等进行了界定,这些成果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问题研究,为一些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其次,为论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这一新研究视角的研究意义和历史必然性,在研究的构建中,本书第2章将对话平台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相衔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对话和实践对话,国际对话

平台的建构经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初就具有对话的特质,推导出其本身亦是对话平台的产物,从而揭示了对话平台的构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作用;另外,第4章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有属性角度剖析出构建对话平台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属性的诉求,这些都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新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对话平台这一研究视角作了扎实的论证,形成逻辑清晰的理论证明,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再次,本书在论证挑战性因素时,没有选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挑战,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对话平台面临的挑战,这是全新的研究。同时,避免了单一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力求全面、深入地 from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世情”、“国情”、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多方面探讨对话平台面临的挑战。在论述广泛性的基础上汇集于研究的聚合性,最终从冲击传统对话平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丰富传统对话平台的价值取向、改变传统对话平台的主体构成三个角度论证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对话平台面临的挑战,处理好了在大背景下作新视角研究的广泛性与聚合性的关系。

最后,在探索如何通过构建对话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面临的写作内容是相当庞杂的,为避免毫无针对性地泛泛而谈,本书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实现途径的举措两个方面入手,分为第5章和第6章。这两章都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层面,从能够通过对话平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度选取内容,两章相互呼应,分别论证理论层面的推进和实践层面的探索,逐一深入探究以对话平台为推手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跳出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借鉴了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对比研究相结合以及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具有一定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为论证具有时代性的较为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从抽象概念转向具体路径探索的研究思路选择。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类课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09JD710003)的研究成果,也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对话平台研究”(NR2010013)的最终成果。感谢王永贵教授、王岩教授等专家同仁的指导与参与,感谢研究生张阳、温珍芳、罗敏、肖艳对本研究的全力协助,感谢教育部高校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问世给予的大力支持,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李栗燕

壬辰年初春

于金陵东华湖畔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明义与析理	1
1.1 大众、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
1.1.1 大众的概念辨析	1
1.1.2 “大众”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内涵	6
1.1.3 大众化的起源与发展	9
1.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与历程	9
1.2 话语权与对话平台	14
1.2.1 话语与话语权	15
1.2.2 对话与对话平台	19
1.2.3 话语权主导下的对话平台构建的必然性	23
第 2 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对话平台及其现代启示	25
2.1 对话平台催生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25
2.1.1 对话平台阶级基础的生成	26
2.1.2 与三个理论来源的深刻对话	29
2.1.3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对话中生成	35
2.2 对话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37
2.2.1 国际上的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37
2.2.2 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3
2.3 对话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启示	52
2.3.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对话中取得的经验	52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对话中的困境因素	60
第 3 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对话平台面临的挑战	64
3.1 全球化进程冲击了传统对话平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65
3.1.1 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及其意识形态性	65
3.1.2 全球化进程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69
3.1.3 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	73
3.2 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观丰富了传统对话平台的价值取向	80
3.2.1 经济转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81
3.2.2 经济转型过程中负面效应的干扰	82

3.3	当代社会阶层的变迁改变了传统对话平台的主体构成	85
3.3.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	85
3.3.2	贫富分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	89
3.3.3	利益分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	93
第4章	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思考:构建对话平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95
4.1	构建对话平台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属性的诉求	95
4.1.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有属性	95
4.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对话平台的应有特质	103
4.2	理性思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念指向要求构建对话平台	106
4.2.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要求人民利益的更多表达	107
4.2.2	和谐社会的要义要求建立对话平台	109
4.3	现实呼唤: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是对话平台构建的策动力	111
4.3.1	客观认识国内各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	111
4.3.2	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关系	112
4.3.3	意识形态国际博弈新常态为对话平台的构建提供了外部条件	114
第5章	发展与引领:理论层面的推进	116
5.1	经济层面:所有制经济理论的创新	116
5.1.1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创新推进	116
5.1.2	我国当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特点解读	119
5.2	政治层面:保持先进性、科学性的理论推进	122
5.2.1	执政党理论	122
5.2.2	民主政治理论	124
5.3	社会层面:适应社会阶层变迁的新兴理论倡导	127
5.3.1	新的社会阶层理论	127
5.3.2	公民社会理论	129
5.4	文化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下的先进文化建设	130
5.4.1	先进文化建设	131
5.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132
第6章	巩固与塑造:实践层面的探索	135
6.1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巩固对话平台的物质基础	135
6.1.1	保证对话平台建立在稳固的物质基础之上	135
6.1.2	巩固对话平台物质基础的具体举措	136
6.2	增强执政党的先进性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以营造对话平台的民主政治环境	140
6.2.1	稳定的民主政治环境是促进对话平台完善的保障	140

6.2.2 增强党的先进性、为建设服务型对话平台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141
6.3 加强社会各阶层、组织等参与对话平台的力度	146
6.3.1 增强各阶层、组织等在对话平台中的价值归属感	146
6.3.2 加强各阶层、组织参与对话平台建设是增强价值归属感的重要渠道 ...	148
6.4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提供对话平台的智力支持	152
6.4.1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完善对话平台的智力支持的必然举措	152
6.4.2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举措	153
结语.....	159

第1章 明义与析理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无产阶级求得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大众化进程中获得了自己的物质武器,也赋予了无产阶级以精神武器,成就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辉煌图景。然而,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和大众化对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只有深切理解了当代中国这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历史境遇,才能有效地探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路径。

1.1 大众、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当代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审视与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所在的国度不同、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方式和方法不同等,而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因此,从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大众”、“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内涵、实质和时代特征入手,是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1.1.1 大众的概念辨析

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加剧,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由单一变为多元,“大众”的内涵已发生改变。而大众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象,因此,必须关注“大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内涵与构成,以及其在当下的现实存在与发展状态。“大众化”的形式与路径同样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只有沿着这一视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切解读“大众”、“大众化”,才能全面理解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我国汉语词典对“大众”这个词语的解释之一是泛指“民众,群众”。《东观汉记·铄期传》:“上惊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众披辟。”宋代苏轼在《王仲仪真赞》中写道:“至于缓急之际,决大策,安大众,呼之则来,挥之则散,惟世臣巨室为能。”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也写道:“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简而言之,大众,

就是指民众。

1. 相关概念的辨析

1) 大众与群众的区别

群众,按现代汉语的解释,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即与“人民”一词同义。《荀子·劝学》“群众不能移也”、《史记·礼书》“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宋代王安石《虔州学记》“尚可以鼓舞群众,使有以异于后世之人”,以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等文献中所用“群众”一词,即指众人,民众。二是指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人,表示“党员”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的区别。因此,群众是政治范畴内的概念,相对于干部、党员、团员等而言,包含范围相对大众来说较小;此外,群众是个政治学概念,而大众是偏向于传播的概念,相对于小众,是在某一方面有最大数量的社会成员认同的那一部分。

2) 大众与人民的区别

人民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基本社会成员。根据汉语词典,人民有以下两种解释:一指“百姓,平民”,即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闻义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人民服饰,惟有毡衣。”《水浒传》第二回:“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巴金《探索集·后记》:“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二泛指人类。《神异经·西南荒经》:“知天下鸟兽言语,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谷可食,草木咸苦,名曰‘圣’。”唐李冗《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鲁迅《朝花夕拾·无常》:“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活无常)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无性别区别的政治语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并不指向任何一个人。

3) 大众与公民的区别

按照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的《新华词典》,公民的定义是:具有一定国家的国籍,依据法律规定享有政治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这一解释也是“公民”一词

最通俗的含义。“公民”的称呼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也叫“市民”。古罗马时代就曾经颁布过“市民法”,也就是公民法,用来调整罗马市民之间的关系。到了欧洲封建时期,随着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公民的概念也不再使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也普遍使用了公民这个概念。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的公民。因此,公民是与外国人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范围较广,包括全体具有我国国籍的社会成员。公民一般表示个体的概念,是非集合概念,是具体的概念,可以落实到某个人的身上;大众所表达的是群体的概念,是集合概念。

2. 当代中国大众的基本特征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工农可以说是我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掌握社会大众新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大众,理论和实践工作才能有的放矢。

在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的专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①。作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②经理人员阶层;③私营企业主阶层;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⑤办事人员阶层;⑥个体工商户阶层;⑦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⑧产业工人阶层;⑨农业劳动者阶层;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根据上述报告对社会各阶层的分类及比例的统计,可以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基本特征。

1) 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重点人群之一是产业工人阶层

一方面,产业工人的经济收入低、教育水平不高、身体素质不高、向“上”流动的机会少,其唯一的利益表达机构(工会)代表产业工人利益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产业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已经淡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规模、内部结构、整体素质和先进性方面呈现出普遍提高的态势。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有企业的工人相继下岗、失业,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没有也不容许发生任何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结构入手实行战略性调整,是顺应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历史选择,在此过程中,一些亏损严

^①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25.

重的企业关闭停产,虽然一部分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职工要面临下岗,但从战略全局上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通过健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社会保障机制,来提高工人的经济状况、保障工人的利益,进而重建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2) 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重点人群之二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包括农、林、牧、副、渔的生产者,是中国最庞大的社会阶层。从户籍身份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里出现的农民工依然是农民;从职业来说,他们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从社会归属来看,他们根在农村。农民工正处于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型时期。不管是纯粹的农民还是打工的农民,相对而言,他们处于文化水平低、收入水平低、社会地位低的状况。由于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率水平依然低下,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者收入低下,农村教育网络落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个阶层是中国所有阶层中整体文化程度最低的阶层。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文化程度最低来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处于落后的简单劳动状态。农业生产落后表现为产业结构落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文化程度低、生产率低,因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从整体看,也是处于最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社会地位低下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乎不掌握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也低于其他阶层。除受现实状况影响外,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还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传统因素的影响。但是据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自我评价不是最低的,比产业工人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高。^①

3) 中间阶层的凸显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除十大社会阶层外,当代中国还可分成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并预测“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间阶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在党的正式报告中使用的是“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大众对中间阶层的认同主要基于对其经济地位的认可,而我国中间阶层的自我认同出现多元偏差。中间阶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社会阶层,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是中间阶层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迅速发展的基点。我国在所有制上,公有制为主体;在资源配置上,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共同发生作用,现在属于不完

^① 孙永芬. 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48.

全市场经济。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中间阶层有三个特点：“资本”拥有的不对称性、生活方式不匹配和难以区分性、民主意识淡薄。先看“资本”拥有的不对称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对资本类型作了精辟划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陆学艺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拥有量的多寡为标准。但是中间阶层拥有这些资本或资源并不对称，也就是说，根据经济指标判断属于中间阶层的群体，在文化指标上却未必属于。当资本拥有量不对称时，各资本之间会发生流动，以达到一种平衡，如富商需要学者出谋划策，学者因此得到经济回报，弥补经济资本的不足。在健康和谐社会中，资本的转换、流通通畅，保证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如果社会机制不是很完善，资本转换不是很通畅，这时各种资本就可能以不健康方式转换，从而导致官员、商人与学者相互勾结，这样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造成破坏。比如大学教授，文化资本多，但是收入低，他就会外出兼职，收入越低，兼职时间会越多，这不利于他培养学生，不利于学校科研的持续发展。再看中间阶层生活方式的特点。一般而言，一群人经济水平差不多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是一致的。但是我国中间阶层部分人生活考究、衣着时尚，绝大部分人生活简朴、讲求实惠。这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毕竟国人的富裕才是近30多年的事。最后看民主意识淡薄的特点。民主要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却不要民主。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批新富群体表现突出。尽管这部分人日渐淡出中间阶层的主流，但他们对民主的实施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推动是一个不小的障碍。我们要掌握我国中间阶层的特点和心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扬他们敢于奋斗、锐意改革的时代精神，弘扬他们的传统美德，正确引领他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当前所说的“大众”已经由之前的单一一变成多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使用“大众”这个概念时，也毫不掩饰地揭示了其包含广泛的、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以“人民大众”来指称“无产阶级”，也曾经以“国民大众”来指称农民和小资产者。^①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②列宁也曾明确地将“大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 第1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95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 第1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332 , 386 .

细分为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地主大众等。^①对“大众”这个概念的关注和深切理解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民众力量,进而领导中华民族赢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将“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②,一切“革命阶级”称之为“人民大众”^③。但同时,毛泽东也曾多次强调过“人民大众”构成成分的多样性及其在多方面的差异性。经过对“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反复分析,他明确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④;等等。没有对“大众”的构成及其在革命立场、所负使命、阶级特征等方面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显然不可能有对“大众”的广泛动员、强力凝聚和充分引领。

1.1.2 “大众”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前的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分化,一些新兴阶层成长起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阶层正在发育成型。社会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甚至产生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样化已经越来越鲜明地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的基本特征。我们所谓的“大众”,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烈、鲜明的“多质”存在的特点。利益与阶层的分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等,都成为“大众”以“多质”的形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表现。我们所谓的“大众”也越来越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的特点。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日趋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及日趋多质的大众,显然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内涵必须关注的新课题。

1. 改革开放前我国大众的身份划分系列^⑤

学者孙立平在研究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时,详细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

① 列宁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

② 毛泽东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87.

③ 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6,727-728.

④ 毛泽东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6.

⑤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6.